

# 阮大鍼研究

## (一五八七—一六四六)

邱榮裕

### 一、前言

中國在十七世紀前後的政治、經濟、社會、思想等各層面的變化，近些年來深受近代國際漢學界的重視，以爲此時期是中國近世史的起點<sup>(1)</sup>。這段時期約略始於明萬曆中期，止於清雍正年間。一般學者專家以爲將此時期視爲一個整體來研究，較能全面清楚了解這段從晚明到清初的整個變動過程。在這變動過程中，明末知識份子對變局的肆應，是一個頗值得重視及討論的重要專題。

自古以來，道德觀念即成爲我國評價一個人在歷史上成敗的重要指標。這種注重道德的習尚，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清自乾隆皇帝起就加強這方面的提倡，尤其強調忠君的教化。因此明清之際的知識份子爲肆應變局而降清、事清的人，便被編入不忠不義，大節有虧損的「貳臣傳」之列裡。這些人此後不但被鄙視，同時在歷史的研究上也被不恥而遭受漠視的對待。歷史研究由於受到道德觀念的影響而極端化，因此明清之際的若干史實與真象，很多就被隱沒而不彰顯，一般人也就無法清楚的瞭解這段時期知識份子實際肆應變動的情形。近些年來陸續整理公布的明清部份檔案，有助於這段時期的歷史研究，若干史實也就因此獲得應証，然而資料檔案涉及滿文的閱讀能力，一般學者運用也就頗費工夫了。

至於有關此一時期知識份子肆應變局的研究，近些年來國內受到國外漢學研究的影響極大。國外漢學者如；Frederick W. Mote, John D. Langlois, Fredric Wakeman Jr.等，他們對此一時期的研究方法及觀念，均對國內的研究方向有所影響<sup>(2)</sup>。使得國

(1) 參閱劉廣京：《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序》（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民七十三年四月出版），頁二。

(2) 參閱王成勉：「明末士人之抉擇—論近年明清轉接時期之研究」（台北：食貨月刊，民七十五年四月一日），復刊卷十五，期九、十，頁六六至七一。

內在此方向上，不再以傳統嚴厲的儒家道德觀念來討論與評擊這時期知識份子的作為，而改採以人文主義 (Humanism) 的觀點來研究及解釋，以便探討知識份子如何肆應變局，同時藉以了解其在整個過程中適應的實際情形。本文所謂變局並不僅限於朝代的更迭，亦函君主更替繼承的不同政局而言。

本文以阮大鍼作為研究對象，理由有二；第一個理由為終其一生除處於明清交替之大情勢下外，更經歷了神宗、光宗、熹宗、莊烈帝，弘光帝等不同的政局，由於政局之更迭，其在變局中的肆應，除可代表一部份知識份子肆應變局之型態外，亦可明瞭各政局的實際情勢。第二個理由則是個人對阮大鍼的文學成就產生研究興趣，一般文學史對阮大鍼文學之介紹甚為簡略，主要原因或許是受明史以奸臣論斷阮大鍼的影響，而鄙視其人，由於不滿現有的說法乃欲對此一主題有所深入探討。

本文之研究方法主要係採歷史研究法及比較研究法，務求重現史實，再予解釋。由於資料搜羅不易，冀望日後能詳加補充。

## 二、 家世與社會背景

明末黨爭激烈，崇禎即位後，復社繼東林之餘風，成為當時社會清議的中堅，社中人士臧否人物，以忠君思想及傳統儒家道德觀念為主要依據，因此極為不齒崇禎欽定逆案人士。阮大鍼頗富文學、詩詞才華，但因名列逆案，而不被復社人士接納，反遭受誹詆，甚至被視為南都禍福的最大威脅者，以為早日掃除南都奸佞之首的阮大鍼，即可為國家及南都消除禍患。故而復社發布「留都防亂公揭」以逼迫阮大鍼在南都銷聲匿跡，然而卻也因此種下了與阮大鍼決裂的局面，成為引發弘光朝政爭的主要遠因。

(3)

明史將阮大鍼列入奸臣列傳之殿，供作後人借鑑。以後學者論述阮大鍼，亦均承襲明史的論斷，而鄙視其人，貶損之詞，甚且涉及其家世，而未能予客觀適當的評論。明史之著述，其源始於萬斯同<sup>(4)</sup>，萬斯同則為黃宗羲得意門生，受黃宗羲影響極深，

(3) 參閱邱榮裕：「明末復社發布『留都防亂公揭』始末及其影響」（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歷史學報），期十五，頁二〇一至二〇二。

(4)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台灣中華書局，民四十七年六月出版），頁八八。

由於黃宗羲與阮大鍼二人先前於「留都防亂公揭」中有所糾葛，以後又延續至弘光朝之政爭中<sup>(5)</sup>，因此黃宗羲門下對阮大鍼自當是處於敵對立場，凡有關阮大鍼之劣跡者，皆成為所搜集羅致的對象，影響所及，甚至連帶對阮大鍼之曾祖阮鶚，亦無好評。明史於清乾隆間經官修欽定後，自然成為一般人依據的對象，而鮮有對其立論產生懷疑詳加研究討論者。

近人柳詒徵於阮大鍼所著詠懷堂詩集跋中，就阮大鍼的家世如此描述：

阮大鍼曾大父鶚、從祖自華皆有才學，而不軌正。鶚從歐陽南野，游王學支裔也，而盜虛譽，以貪墨敗，……自華偃蹇駘蕩，仕輒不得志……至大鍼遂為有明一代奸臣之殿，得罪名教，隕首巖石，其亦家世賦遺然歟<sup>(6)</sup>。

柳先生以為阮大鍼之所為，乃是家世使然。這種說法，以為有值得商榷的必要。由於明史攔斷資料，有關阮大鍼家世詳情，祇有從其他方面探尋。依據地方志資料所載，阮大鍼家世頗為顯赫，其先人功名事跡均博得鄉人稱頌，甚且入列鄉賢祠中，為後人敬奉景仰。此種事實之記載，顯然與柳先生的說法有著很大的差異。

安徽省懷寧縣志中，名宦鄉賢祠條記載著入祠祭祀的緣由與取捨標準，其內容為：

祭法云，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捍大菑禦大患，則祀之。又禮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鄉先生之賢者，沒而祀於社，皆崇德報功之意。明太祖二年，令天下學校皆建祠，左祀賢牧，右祀鄉賢，□有遺愛在人，鄉評有據者，即入祠祀。<sup>(7)</sup>

依照上述方式，懷寧縣志中所記，載於名宦祠祀的歷代賢牧有八十二位，其中不乏歷史上的知名之士，如陶侃、蘇軾、史可法等人。又縣志中所記載於鄉賢祠祀的歷代鄉賢有八十三位，其中有阮廷讚、阮鶚、吳嶽秀、阮自華、左光斗、雷縯祚等人。前四

(5) 邱榮裕：前文，頁一九五。

(6) 柳詒徵：「詠懷堂詩跋」，詠懷堂詩集（民國戊辰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印行）。

(7) 懷寧縣志，中國方志叢書第七三〇種（台北：成文出版社，民七十四年三月台一版），頁四六四。

者與阮大鍼有親屬關係，其關係分別是；阮廷讚爲高曾祖，阮鶚爲曾祖，阮自華爲從祖，吳嶽秀爲阮大鍼妻之祖父。。後二者則分別於明末公案上與阮大鍼有所糾葛，本文不擬討論。按懷寧縣志所載之事實，阮家於有明一代有三人被選入列鄉賢祠，供作鄉人祭祀景仰的典範，此種例子是極其難得的。從這個事實亦可說明阮大鍼的先人並非柳先生所謂的「不軌正」，反倒是鄉里先賢，足爲後世楷模。其先人事跡別陳述於后：阮廷讚字邦器，又號愛雲翁，鄉人以悌弟稱之。縣志載：

早失怙恃，既長痛不逮養，事兄猶父，委曲承順，家政一以爲主，兄偶有譴責，廷讚怡然不□介念。兄好訟，廷讚屬諫之，後有僧讎其兄，誣以爲盜，吏捕之，廷讚使其兄逃，代就捕備受拷掠，曰我兄非盜，必欲誣盜，盜者我耳。……上官憐之議釋。後兄疾，親侍湯藥至癢寢，既卒哀祭盡禮，不以久懈。<sup>(8)</sup>

由此可知，鄉人供奉阮廷讚的主要理由就是孝悌的風範，鄉紳欲借其榜樣教化鄉人。阮廷讚有二子，長爲阮鵬，次爲阮鶚。由於廷讚榜樣，家風使然，阮鶚對於其兄的嚴厲教誨，也就毫無怨言。阮鵬字應徵，爲郡諸生，爲了栽培其弟以光宗耀祖，乃就對阮鶚施予嚴格的管教，甚至到「施夏楚，創至不能衣」的地步，其時間長達十五年之久<sup>(9)</sup>。阮鶚在這種教導方式下，乃於明嘉靖甲午（一五三五）年中了應天鄉試，而後又於甲辰（一五四四）年中了進士，成爲阮家第一位有功名的人，不負其兄的期望。阮鶚取得進士之後，自是提攜兄之子阮自嵩，而於嘉靖乙卯、丙辰（一五五五、五六）年聯捷獲得進士功名。阮自嵩任官刑部，治獄惟謹不徇，因屢觸權要，遂遭嚴嵩父子銜之，而被謫往沔陽任官。阮自嵩亦不改其關心民隱之志，曾將侵奪民田的藩王家臣繩之於法，最後復因忤逆權貴，而以滄州守拂衣歸里<sup>(10)</sup>。阮自嵩有二子十二孫，其子之鈿、之鈺二人均死於明末忠烈之事；阮之鈿以派守穀城，不屈降於賊匪而死於忠。阮之鈺則以居城遭賊攻破，爲保護母親安危而死於孝。

(8) 桐城續修縣志，中國方志叢書，第二四二種（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六十四年台一版），頁六三五。

(9) 同前，頁三一〇。

(10) 懷寧縣志，頁九一二至九一三。

阮鶚字應薦，號函峰居士。於嘉靖甲午（一五三五）年中應天鄉試後，而於次年遊南雍受教於歐陽重德，自是盡棄平日馳騫之見，篤信致良知之學<sup>(11)</sup>。甲辰（一五四四）年中進士後，初授南京刑部主事，任官因「敬簡明允，精於獻比」而聲名鶚起。以後繼任監察御史巡視光祿，人均懾其風，因而裁省浮費頗有成效。己酉（一五四九）年巡視倉場及河道、蘇運等，劾罷不稱職的漕運官吏，使得漕政肅明。後改任畿內督學，阮鶚以身表率，倡正學風，不避權右。庚戌（一五五〇）年間北虜入犯，毅然以憂時捍患爲己任，條陳禦虜十事，慨然有濟弘猷之志<sup>(12)</sup>。癸丑（一五五三）年擢陞爲浙江提學副使，適時浙江以倭寇之患爲苦，阮鶚乃因地制宜培養人才，並操以兵事之業以爲防禦倭寇之有效之策。乙卯（一五五五）年間倭寇侵犯省城，有司拒鄉民入城避難，阮鶚乃手劍開門納之，鄉民全活甚衆<sup>(13)</sup>。次年台省交章推薦阮鶚有「文武之才，可以大用」，乃擢陞爲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浙江一帶。阮鶚乃展布禦寇方略，並誓告將吏，以爲同仇敵愾。同年四月倭寇攻乍浦、圍桐城，阮鶚乃冒重圍之險入城禦寇，由於孤城力乏，曾數請救援而不獲接應，猶做困獸之鬥。倭寇更持總督紅牌於城下議和以搖惑人心，阮鶚仍力持固守之策，倭寇計窮乃退，桐城遂得保全。時人少宰程序論述此次桐城遭受倭寇包圍的困境，以爲阮鶚有睢陽之節，武穆之忠的器度<sup>(14)</sup>。適時尚書趙文華與總督胡宗憲共持與倭寇議和之論，唯獨阮鶚銳然力持決戰之議，胡宗憲恐陰用離間之策密洩而不告知。由於阮鶚力主剿寇不與議和，讒忌因是漸起，忌者爲謀奪其柄，乃陰薦阮鶚專鎮閩地一方，以爲困頓之計。時閩寇方張，而地方兵弱財匱。丁巳（一五五七）年間倭寇犯福寧、福清、海口等地，阮鶚日夜治兵，不惜重賞獎勵，兵士乃奮勇擊寇，任事不過數月，捷書迭易飛奏，忌者力謀傾功，以風聞論例之法，指摘其糜費儲餉，肆爲萑菲，遂被逮送至京。然而阮鶚至閩剿寇募兵、造

(11) 李春芳：「右僉都御史函峰阮公鶚墓志銘」，國朝獻徵錄（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民五十四年元月出版），頁二七四一。

(12) 同前，頁二七四二。

(13) 明史，卷二〇五，列傳第九三。

(14) 李春芳：前文，頁二七四二。

戰艦、捐賞等均有造冊填寫，卷牘具在。有司覆視，卒莫能中傷<sup>(15)</sup>。阮鶚歷經此事遂解職歸鄉，居家隱逸，不問政事。後因言官會論胡宗憲督府侵佔浙餉之事，復遭波及，阮鶚曾疏請兩省互覈，然而人多依違其間。丁卯（一五六七）年阮鶚病情轉劇，經伯子伏闕陳情，乃由大司徒馬森、大司馬霍冀兩人合疏題覆兩省巡按覆報，此事獲得澄清昭雪後，乃歿於正寢。阮鶚身平注重師道，曾哭送歐陽重德旅視，以盡弟子之禮。任官不攀附權貴，以謀顯達，堅持盡忠職守，德澤於民。其在浙之任事，浙人感念恩德，遂於其逝世後立廟崇祀<sup>(16)</sup>。據此可知，明史記載阮鶚為「盜虛譽，貪墨敗」之論，實為不實之言，其之所以如此，恐原因於黃宗羲門下鄙視阮大鍼之故。

阮鶚有二子，長為阮自崙，次為阮自華。阮自華於萬曆戊戌（一五九八）年中進士，初授福州司理，再任饒州，迎母就養，侍母至孝，丁艱扶襯歸服闋。後轉任戶部郎權稅德州，而於慶陽守解任歸鄉。其歷任職務皆有廉幹之聲<sup>(17)</sup>。其學則嗜古推崇經典、墳索、汲冢、禹穴之書。湯賓尹評論其學為「人厭薄唐宋而學秦漢，子獨厭薄秦漢而學周以上」<sup>(18)</sup>。崇禎改元再起邵武，興利剔蠹，惠政孔多，亡何即乞休，日與海門諸子修禊觴詠，以騷雅主盟詞壇，問字之士，屢滿戶外<sup>(19)</sup>。時值流寇侵犯陵寢，盤踞安廬，使得西南之地，無安寧之日。阮自華乃發憤條陳萬言致劉若辛轉呈，尋因憂懣而卒<sup>(20)</sup>。由上述可知阮自華絕非錢謙益所說的「偃蹇駘蕩，仕輒不得志」，而是一位有理想抱負，文采斐然，而利祿澹泊，關懷國是的人。

阮自崙又稱清字先生，舉孝廉，為嘉靖辛酉（一五六一）年舉人，曾於其父阮鶚力戡大憝，以忤大相去朝時，上書肅皇帝陳白父冤，狀悲感人<sup>(21)</sup>。生有二子，長為阮以鼎，次為阮以翼。阮以翼為阮大鍼之生父，大鍼後過繼予阮以鼎做為嗣子。阮以鼎

(15) 同前，頁二七四三。

(16) 同前。

(17) 懷寧縣志，頁九九二。

(18) 同前。

(19) 同前，頁九九三。

(20) 同前。

(21) 顧起元：「盛唐阮公墓志銘」，癡真草堂集（台北：文海出版社，民五十九年三月出版），頁三三六〇至三三六一。

字太乙，別號盛唐，爲萬曆戊戌（一五九八）年進士，與從父阮自華同榜，兩人同年登科，其時阮家盛會可想而知。阮以鼎初授戶部河南司主事，繼又督倉德州，其間任事，約束部屬惟謹，並釐清倉輸，嚴斷苞苴，使得奸猾之徒無從牟利。歲滿贏餘，積羨均造清冊，以備他日之缺，未圖自潤中飽。後被推爲河南參政兼僉事備兵信陽，時阮以鼎已積勞成疾，欲圖歸省，然而銓曹以中州缺官已久，催促就任，既至，病即大作，因此病逝於任內。阮以鼎病中託孤於家人，謂「大鍼能繼我志」。彌留時仍以「國恩未酬，民隱未卹，有負郡邑長吏父老」爲憾事<sup>(22)</sup>。其在浙時曾拜阮鶚公祠廟，追悼先祖功業，並立志效法宏揚，因此居官十三年，田廬無所增置，族黨誦義無間言，對利祿之途澹然，任事皆以清除弊端，釐清政事爲要，由於吏治清白，深得民衆愛戴，其喪歸里，泫然流涕者且萬人。<sup>(23)</sup>

吳嶽秀與阮大鍼的關係，乃是阮大鍼娶其孫女之故<sup>(24)</sup>。吳嶽秀字幼鍾，爲吳宗周之子。於萬曆庚辰（一五八〇）年中進士，初授中書舍人，後遷禮科給事中，任事鯁直；如請立皇儲、彈劾威貴諸疏，均慷慨披瀝，無懼權貴，處之坦然。後以忤逆權貴，謫出河南右布政兼按察使僉事，遂陳疾乞歸。曾與同年顧憲成諸人講學東林，以道德文章相砥礪。晚年究天理，以爲學者入聖之道。其爲學態度可用其自寫之聯句「儼龍見于尸居小心翼翼，聽雞鳴而蚤起爲善孳孳」來概括。<sup>(25)</sup>

綜合而言，從前述例証中，可以得知阮大鍼先人任官所抱持的原則是惟謹不恂，體恤民瘼，盡忠職，亦不攀附權貴以求利祿，這種作爲是符合傳統儒家對爲政者賢良與否的要求，故而柳詒徵以「不軌正」來評斷阮家是不正確的。此外中國長久以來個人受家庭、宗族的影響很大，由於家族觀念濃厚，光宗耀祖之事自然成爲每一個家中成員所欲達到的目標，因此家族成員相互提攜是被視爲當然與必然的現象，故而一個昌盛的世家在子孫承先啓後之下，乃能發揚光大而維繫而不墜。上述阮氏家族就可以爲這種事例做一明證。阮大鍼爲從阮鶚傳下的第四代子孫，由於家世、姻親之淵源深

(22) 同前，頁三三五九。

(23) 同前，頁三三六〇。

(24) 同前，頁三三六二。

(25) 懷寧縣志，頁八七一。

厚，使得阮大鍼於年少就顯露出不凡的犄角，這就無怪乎其父阮以鼎於病中，能頗感安慰的認為大鍼能繼任其未完成之志。是故爾後，阮大鍼機敏的才思及涉獵廣博群籍的智識，遂成為令人注目的對象了。

### 三、變局中處世歷程

一般言生物在適應環境方面，均以被動的方式進行其個體對環境差異的肆應。人類最初亦是如此，然而由於人類有一般生物所沒有的智慧，故能從被動中產生主動的情勢進而調適生存環境，這種習性在人類所獨有的政治行為中可明顯的看出來。譬如個人隨著所處政治環境的更迭而有所改變的例子。此種改變在政治行為而言可視為人對政治情境的調適，亦即是個人為延續其政治生命來達成其抱負、理想等之要求下，而在變局中的一種肆應行為。由於生存的追求，傳統儒家觀念影響下的知識份子如何在變局中調適自己，是一個頗需經歷自我矛盾與掙扎的過程。這種知識份子的調適過程是很值得研究的，因此要明瞭其過程是如何調適，以為較方便簡單的方法，就是從其所經歷的不同階段際遇中，加以分析研究、比較之後，再予解釋，才能了解實際情形，從而評價其個人歷史地位。

阮大鍼（一五八七—一六四六）個人之經歷約略可畫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屬避開黨爭時期，從萬曆年間至天啓年間。第二階段屬仕途隱晦時期，為崇禎年間。第三階段屬介入黨爭時期，從弘光年間至降清。此三個階段正好分別將阮大鍼在不同政局中的不同際遇加以討論，從其不同際遇的情境中，可以瞭解其如何自處以及如何改變困頓的情勢，而圖東山再起。阮大鍼一生宦途概略而言；十七歲舉於鄉，三十歲中進士，其時為萬曆四十四（一六一六）年，亦是清成立王朝為天命元年之時。初授任行人，至天啓初年擢為給事中，尋因憂歸而辭官。初在台中任事時，同年左光斗引以為同志<sup>(26)</sup>。天啓四（一六二四）年，補任吏科都給事中，不一月，遽告歸。後又尋被召任太常少卿，任數月，復乞歸。崇禎元年（一六二八）起陞光祿卿，後遭言官劾諫，罷歸。次年崇禎皇帝欽定逆案，牽連其中，遭削奪配贖為民，乃歸里隱逸。隨後至弘

(26) 梅村野史：鹿樵紀聞（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民五十一年十一月出版），台灣文獻叢刊，第一二七種，頁四九。

光朝復起，任江防兵部尚書，逮清兵南下，南都不保，遂降於清。

### （一）避開黨爭時期

明神宗自萬曆十（一五八二）年張居正死後，開始親政，然而行事常遭受臣子規諫無法隨意施展，在憤怒、無奈的心情交雜之下，也就以消極態度作為抗拒的手段，深居宮中，恣情聲色，不見大臣，不理政務，一切奏疏均留在宮中，不置可否，以為回報。神宗如此放棄職責並沒有使政府陷於癱瘓，由於明朝政府中，文官集團因承襲歷來規制，而形成了自動控制程序，可以自行處理例行公事<sup>(27)</sup>。然而明神宗長久廢弛政務，影響所及，大臣亦以消極敷衍的態度來應付局面，萬曆時期的這種政治氣氛，使得忠於職守者缺乏信心，而讓貪污腐敗者更加有機可乘。其中有一部份文官未不使貪污腐敗者逞其私慾腐壞朝政，遂建樹一種精神的領導力量，發憤力挽狂瀾，以使朝政不致墜落，而認為作個君子應自強不息的奮鬥，決不可消極退讓和放棄職責<sup>(28)</sup>，如此形成了所謂的東林黨人。東林黨人標榜自己品德，指斥與他們不合的為小人，由於這派中有若干人被任命為吏部和都察院的官員，職司百官的考察和彈劾，因而藉定期考核的權力，大刀闊斧地斥退認為不適任的官員，然而東林黨人並不具有絕對權威及公正裁判，因此無法博得其他人的信服。反對者亦同樣的以其之道還治其人，即用道德倫理的名義組織集團以資對抗，故而從萬曆至天啓年間，有東林黨與非東林黨之爭，由於爭鬥激烈非東林黨人乃與宦官相結合，而使得奄黨權勢大增。

阮大鍼即在上述的政治情勢之下初任行人官職，至天啓初年始擢陞給事中，尋以家憂而辭歸。這時期其家不攀附權貴的家風，似乎讓阮大鍼在政局黨爭混亂的情勢下，避開了災禍。天啓四（一六二四）年吏科都給事中有缺，同年左光斗得知其依序當遞補此缺，乃招之前往赴任<sup>(29)</sup>。

由於吏科掌有考核官員之權，時吏部尚書趙南星及楊漣、高攀龍等人皆為東林黨人，為謀引黨人魏大中任此職，乃藉風評阮大鍼為「輕躁不可任」之由，而以魏大中

(27)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台北：食貨月刊出版，民七十五年四月三版），頁八四。

(28) 同前，頁八六。

(29) 同註(26)。

補缺<sup>(30)</sup>，等阮大鍼趕至時，乃更補爲工科。阮大鍼對此事耿耿於懷，甚感不平，爲討回受東林黨人侵犯的權益，以爲非得藉奄黨之勢不可，遂與楊維垣、倪文煥、霍維華等人相善，而寢推魏大中。吏部乃不得已，更補阮大鍼任吏部都給事中，然而阮大鍼卻畏懼日後東林黨人攻訐，因此任事尙未一個月，遂辭官，而由魏大中名正言順遞進補任。以後又被召任太常少卿，由於需要與魏忠賢相見，阮大鍼每次均抱著謹慎的態度，出入魏府，並以重金賄賂門房以索回拜帖。阮大鍼如此作爲，是深恐有證據留在魏府，而爲日後引來大患。太常少卿任職數月，即乞退辭官。阮大鍼適時勇退，亦許是其澹泊利祿的家風適時發揮了作用，除了挽救阮大鍼外，也使得其家族避開了激烈的黨爭禍事，然而其好俠樂善，爲人亢爽的性情<sup>(31)</sup>，卻使得他與奄黨之人糾葛不斷。

崇禎皇帝繼任，魏忠賢失勢，楊維垣自度處境乃求助於阮大鍼，阮大鍼因前補吏科都給事中之事得其相助，自是不容推辭，乃獻策略給楊維垣，由其自付取捨上疏，以保祿位。策略中其一策爲專彈崔呈秀、魏忠賢疏。另一策爲合算疏，內容大概以天啓四（一六二四）年後亂政者爲魏忠賢，並旁及崔呈秀，天啓四年前之亂政者爲王安，而旁及東林黨。時楊維垣方指東林黨、崔呈秀、魏忠賢等並爲邪黨，而與倪元璐相詆。楊維垣乃獻合算疏以求自保祿位，由於此事，阮大鍼遂被東林黨人視爲黨邪，而遭御史毛羽健之彈劾，遂被罷崇禎元年起復之光祿卿職位。<sup>(32)</sup>

從上述阮大鍼任宦途的經歷中，可以看出其在黨爭激烈的政治環境中，並無野心，始終對東林黨與奄黨均保持著若及若離的姿態而不願介入其中，這期間其權益遭受無理剝奪時，亦會以親附反對勢力作爲反擊的力量，以保障自己利益，然而在其認爲不可爲以免樹敵的思慮下，也就放棄而不抗爭到底。在此時期奄黨勢力顯赫，而阮大鍼卻不極力攀附，反倒持戒慎態度，處處提防，避免捲入殘酷的政爭之中，阮大鍼之所以如此果斷與警戒，與其說個人之認清局勢混沌，倒不如說是受其家風的影響所致。

(30) 徐鼎：小腆紀年（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民五十一年十一月出版），台灣文獻叢刊，第一三四種，頁二四五。

(31) 懷寧縣志，頁一〇〇五。

(32) 徐鼎：小腆紀傳（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民五十二年七月出版），台灣文獻叢刊，第一三八種，頁八八三。

## (二) 仕途隱晦時期

崇禎皇帝任事沈機獨斷，即位後便將魏忠賢顯赫的權勢盡奪，更且以欽定逆案方式，追究奄黨一千人物，以為可以清除廷門糾紛，釐清政事，而期望有所大的作為，雖然不邇聲色，而以憂勤惕勵的作為來治理國事，但因所用之人僨事，故而復任宦官布列要地。由於崇禎皇帝舉措失當，制置乖方，更而加速朝政傾頹的大勢。阮大鍼則在崇禎皇帝即位後，欲有所作為期間捲入崇禎皇帝清廷門糾紛之事，而於崇禎二年欽定逆案中被列名，遭削籍為民之處罰。

阮大鍼之列名逆案實與魏大中之子魏學廉有關，魏學廉以其父死於獄中，以為是阮大鍼陰指之故，乃將其父慘死事記於阮大鍼身上，故而魏學廉以血書進呈崇禎皇帝，東林黨人亦同聲譏，阮大鍼便在崇禎皇帝自審魏忠賢之逆案中列名。其實魏大中之死，為天啓五年之事。其時東林黨與奄黨政爭激烈，奄黨遂以許顯純誣楊漣等接受熊廷弼的賄賂之事，逮捕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等六人，俱下詔獄。許顯純追索贓款，非法拷掠，初楊漣等堅不承認，但左光斗以為在酷刑拷訊之下，勢必死於詔獄，不如誣服，可移送外廷法司，而得延遲死期，再圖補救，所以他們乃都承認受賄之事。那想到魏忠賢卻矯旨不移送法司，於是在嚴酷追贓拷掠下，楊漣、左光斗、魏大中乃同夕死於獄中，袁化中、周朝瑞亦斃於獄中，顧大章後移刑部獄，不久亦投繯而死，而熊廷弼則遭殺於西市，傳首九邊<sup>(33)</sup>。由此可知，魏大中之死與阮大鍼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其不相干亦可從阮大鍼以戒慎態度出入魏府及辭太常少卿之事，可知阮避魏忠賢惟恐不及，那敢藉魏忠賢之手謀害魏大中，更何況其中亦有同年左光斗牽連其中，其有無關連可想而知。

阮大鍼遭削籍為民，即歸里隱逸。這期間曾先後將其於丙子（崇禎九年）、戊寅（崇禎十一年）、辛巳（崇禎十四年）所作之詩詞集成詠懷堂詩集冊，其中詩詞除致贈友人就任及別離外，亦有抒情、述景、感懷之作、篇數相當可觀，其友人中亦有如明史中評價極高的史可法，亦有評價極低被列入奸臣的馬士英等人。然而此詩詞集冊卻受明史論斷阮大鍼之影響，使得四庫全書編訂之時，而未將此集冊搜羅在內，致使

(33) 沈明璋編著：宋元明史綱（台北：著者自印，民六十八年八月出版），頁二九七至二九八。

阮大鍼詩詞才華不爲世人所周知。一般人祇以阮大鍼之「燕子箋」、「春燈謎」兩傳奇作爲其文學才華之代表，實不知尚有詠懷堂詩之集冊。阮大鍼在詩詞方面的成就是斐然可觀的，近人胡先驥先生以爲詠懷堂詩在自然派詩家中別樹一幟，以爲阮之詩可以表達出英詩人威至威斯之「最微末之花皆能動淚」之精髓。更認爲阮之若干詩句非尋常山林隱者所能作，必愛好自然，崇拜自然如宗教者始克爲之，且不能日日爲之，必幽探有日，神悟偶會「形釋」、「神愉」、「百情有觸」時，始能間作此等超世之語，至於阮在寫景佳句方面，幾美不勝收，以爲非精研內典確有心得之人不能道，又以爲阮之五言古詩，極得陶、王、韋、柳之神筆，而五言律詩則天機完整一氣呵成，尤得王、孟之神髓<sup>(34)</sup>。從這些評論中，可得知阮大鍼詩詞之好。另外陳散原先生則視阮大鍼之詩詞以爲五百年所未見，此恐爲誇大之詞，但也表示其對阮大鍼詩詞的讚賞。

至於對阮大鍼「燕子箋」、「春燈謎」、「雙金榜」、「牟尼合」等傳奇之著作評論，近人林鶴宜先生以爲阮大鍼在劇場藝術上有傑出的表現，認爲在傳奇戲劇中的「科介」、「砌末」、「效果利用」上阮大鍼均有特殊的安排，尤其是在戲劇演出提示演員動作表情的處理方式，使得觀賞者「或癡其神，或悸其腮，或顫其首，或迸其淚」，這種觀察入微，全面注意，實極爲難得。另外在戲劇中亦穿插有歌舞雜技，構思極盡精巧，使得場面浩大，形成了阮大鍼之演劇在舞台藝術上最大的特色。就這方面而言，阮戲插演項目包括；舞隊、龍燈、裝故事、竹馬、滾燈、擬獸舞、踏歌、獅子舞、盤槓，走馬賣解及猴戲等有十一項之多<sup>(35)</sup>。而在效果方面除沿習南戲與元雜劇中的音效外，阮大鍼也增加了鐘、簫、喇叭、兒哭及馬嘶等聲音，阮大鍼之特別處乃在於使用「音樂聲」來處理「主題再現」的手法，使劇本結構及技巧表現，恰到好處。同時阮大鍼也講究服飾與作工唱腔的細膩效果，使得阮氏家班成爲當時著名家班中的佼佼者。<sup>(36)</sup>

由上述可知，阮大鍼雖歸隱，但其文采在詩詞乃至在傳奇戲劇上的才華，卻也未

(34) 胡先驥：「讀阮大鍼詠懷堂詩集」，前書。

(35) 林鶴宜：「阮大鍼石巢四種」（台北：大陸雜誌，民七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卷七三，期五，頁二二三。

(36) 同前，頁二二七。

曾稍息，反倒如泉湧汨汨流出，除了完成詠懷堂詩詞集冊外，也著作了四部至今尚爲人所熟知的傳奇戲劇。而其所訓練之阮家班傳奇戲劇在當時是爲人人所欲觀賞的對象，甚至連讎視阮大鍼之復社人士，對其在戲劇上的成就，也不得不讚賞佩服。阮大鍼此期間由於削籍爲民，歸隱鄉里，雖仕途上遭受挫折，但在文學、傳奇戲劇上，卻表現了傑出的成就，這可說因禍得福。

崇禎七（一六三四）年政局極不穩定，流寇逼至上江一帶，安慶、貴池等地諸紳爲避禍，皆流寓金陵。阮大鍼於金陵，聞流寇日熾，崇禎皇帝將不次用人，就開始招納游俠，談兵說劍，企圖以新聲高會之勢，謀求朝廷以邊才任用，從此阮大鍼始終未嘗一日忘卻仕宦之途<sup>(37)</sup>。至崇禎戊寅（十一年）、己卯（十二年）間，阮大鍼已有「當魁居留都」之氣勢，然而卻爲復社所發布的「留都防亂公揭」所壓制<sup>(38)</sup>。阮大鍼事前雖曾極力欲與復社人士示善，而拉攏解說，忍受嘲笑辱罵，但卻也無法解除復社人士對他的讎視態度。在經歷了此事件後，阮大鍼就杜門謝客，而與東林、復社人士結下相仇的死結。復社所公布的「留都防亂公揭」對阮大鍼所造成的傷害是相當大的，阮之所以未發，乃因了解其尚無法與復社抗衡，故而忍氣吞聲，等待著局勢的轉變。

### （三）介入黨爭時期

崇禎皇帝於甲申（一六四四）國變中，自經於煤山後，明末政局混亂，南京諸吏大員在馬士英以兵勢擁護福王由崧即位之情勢下，也不得不贊同福王登基，而開始南明弘光朝的政局。阮大鍼此時五十八歲，動盪的局勢以乎對其越發的有利，昔時襄助馬士英復任鳳陽總督一事，此刻也得到馬士英的回報。馬極力推薦阮大鍼爲邊才給弘光皇帝，遂得以打破逆案限制，起復任用爲江防兵部尚書。在這起復過程中，由於東林、復社人士繼續讎視阮大鍼而極力阻擾，因此阮大鍼任事後，便與馬士英等人聯手安置逆案中人以爲憑藉。明末的黨爭未因國勢頹危而有所停止，反而在南都持續著。阮大鍼清楚所處的政治情勢，故而在歷經憂患之後，也就毫無顧慮的結合逆案中人，

(37) 邱榮裕：前文，頁一九三。

(38) 陳維崧：「冒辟疆壽序」，轉引自謝國禎：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六十七年二月出版），頁一七八。

與東林、復社人士對立起來，弘光朝政遂日非，隨著揚州軍事的失敗後，南京都城也就很快的淪陷於清兵的鐵騎之下。

阮大鍼在南京失守混亂局勢中，欲與馬士英、方國安等靠攏魯王，然而卻被視為禍害而不被接納，阮大鍼遂降清，由清貝勒安置於部院之中，隨軍征討。時兵荒馬亂，隨征官取食頗為因難，阮大鍼卻有辦法羅列鮮肥，邀請部院諸公暢享口腹以示其相善之意，相聚之時甚且應諸公之請，唱其所編「燕子箋」、「春燈謎」等戲曲以娛眾人。部院諸公在阮大鍼殷勤示好之下，也就接納而比坐無隙。一天，阮大鍼臉面忽腫，部院諸公關切其病，要其暫住於衢州，至軍抵定福州後，才遣人相迎。那知阮大鍼聽聞驚悸不已，疑是東林、復社之人讒言諸公所致，而惶恐異常，乃謂無病，甚且表示其年雖六十，尚能挽強弓、騎劣馬。而後為証明其無病，在抵達仙霞嶺時強行下馬步行，鼓勇而先，部院諸公許久後至，見大鍼馬拋路口，身坐石上，呼之不應，往前視始知阮大鍼已氣竭死矣。<sup>(39)</sup>

阮大鍼在這個階段已邁入老年，其心態再如何達觀，恐也無法抱持著不與為意的輕鬆心情去面對所遭受凌辱的事情。故而以那平日掀髯暢談天下事的氣概，口若懸河的談吐及令人莫測厓際的城府，相機行事以吐怨氣，當為意料中之事<sup>(40)</sup>。因而於弘光朝得邊才拔用復任而與東林、復社人士對立也就不足為奇了。

#### 四、處世角色分析

長久以來中國知識份子就具有獨特的社會地位。他們雖是一小群、一小群的分散在全國各地，卻能憑藉著許多方法，維持著一種優秀份子的群體意識，藉著書信、詩文，或以專誠相訪、途中會晤等方式，來傳達訊息連絡情感，將彼此的共同利益，透過政治組織、親屬關係等之方法而連繫結合在一起。由於知識份子享受了顯著的財富與權力地位，使得人們莫不群起效法以爭取功名，以圖改善個人甚或宗族之生活與社會地位。

(39) 梅村野史：前書，頁五二。

(40) 懷寧縣志，頁一〇〇五。

儒家學說是知識份子的主要依據，因此歷年符合儒家標準的賢能官吏與學者都成為後世典範，儒家信仰與理想經過一代代的反覆申述，於是就構成一組終極價值體系，以為如果人們能遵從便會有助於理想秩序的實現，而個人也能夠確實感到對於成就儒家理想的實現有所貢獻。

是故中國知識份子在受教育過程中，每一階段都會遭遇到以過去事例說明貪婪、放縱、不忠、叛逆等的儆戒性人物做為借鑑，但是當知識份子對過去歷史事實知道更多時，他最初印象中的黑白人物便變得模糊不清了。如評價曹操的角色，是姦賊？是英雄？用儒家專斷的道德觀念是不足以解釋說明的。所以要對一個人下歷史角色評價時，澈底熟悉他生時的環境與當時的道德標準是同樣重要的，藉著閱讀文獻資料可以看出當時環境是紛爭或和平，是興隆或敗落的局勢，進而才能有較為公正的對其歷史角色有公平性的評價。

國內傳統研究歷史人物之角色，往往以儒家傳統觀念，並藉著社會服從權威所認可的規範，對過去歷史人物角色給予界定，雖然可達見賢思齊之功效，但卻無法對歷史事實做妥善的解釋。近代德人社會學者韋柏 (Max Weber) 所提倡之官僚式 (bureaucratic Model) 理論及官僚人格 (bureaucratic Personality) 等有關討論人群關係 (Human Relations) 之方法<sup>(41)</sup>，以為用在我國歷史人物角色的扮演研究，較能客觀且清楚解釋而無偏見，並符合歷史事實的真象。

傳統的中國政局就是一個屬於相當標準的官僚體制，明末的政局也不例外。在這個重視組織、典章制度及具常模程序之體制，個人的地位是不被尊重的，因此對一個人而言，要有所發展與成就，勢必要歸屬追隨體制才能達到目的。阮大鍼個人角色在這官僚體制中，從前章所敘述的家世背景及仕宦過程，可以明顯的看出是依循官僚體制的要求而儘力附和，以為如此可達光耀先人，續保祿位的目的。然而東林黨人的出

---

(41) 姜占魁：人群關係（台北：正中書局印行，民六十六年出版），頁九至十一，頁六八至六九。

所謂官僚模式簡言之，是經由歷史演進、社會變遷等因素所產生的一種社會組織形態，其本身並不含有優劣、是非等價值因素。所謂官僚人格簡言之，即人的行為在官僚體制下，表現出馴服性和服從性，沒有個性，也缺乏獨立性。所謂自導行為簡言之，即行為者扮演某角色時特別重視他本人的觀念和角色期望。

現，不但促使官僚體制發生劇烈變動，也使得阮大鍼的歷史角色有所改變。由於黨爭成為體制人事流動之主因，因此東林排擠阮大鍼似乎合算於其政治利益。阮大鍼於隱晦時期中卻藉著詠懷堂詩集冊、傳奇戲劇的編導與人往來，証明他是一個有明暢思想的人，也是個見聞淵博，通曉經典的學者，冀望以邊才破格任用於混亂的政局中。由於阮大鍼此時遭受欽定逆案廢籍爲民之處分，自然也就沒有官僚體制中所享有的名份地位，因此也就成為復社人士所排擠並嘲弄的對象。阮大鍼的官僚人格在這種刺激影響下顯著的消退，而由憤怒、報復的情緒所替代，伺機行事，以圖東山再起。此種自導行爲 (self-directed behavior) 使得阮大鍼在弘光朝時再度進入官僚體制中，並敢與東林、復社之人抗爭。降清後雖仍在官僚體制中，但卻恐懼東林、復社人士之讒言，使其官僚人格再度顯現出來。

因此綜觀阮大鍼歷史角色，亦與一般知識份子相同，受制於官僚體制中的官僚人格影響。仕宦角色平凡的原因是其始終不敢與體制中政爭主流之派澈底結合，若能如此，亦許能有較明顯之歷史地位。至於明史以奸臣論斷其歷史角色，若以弘光政爭誤國爲由實不足取，似乎囿於私人恩怨所致。

## 五、結 論

綜合而言，阮大鍼於明清之際的變局中的肆應，是隨著政局的改變而有所調適，從調適過程可清楚看出心態深受官僚人格影響的跡痕，最後仍是在無法擺脫官僚體制下追求功名利祿的心結情境中結束了一生仕途坎坷的際遇。

阮大鍼政治宦途受困於明末持續不止的黨爭，使得仕途更迭受阻。初期由於受家風傳統使然，故得以謹慎的態度而置身於激烈黨爭之外，然而卻因憂歸辭官再復出時，與東林黨人魏大中相爭吏部都給事中一職，而遭東林、復社人士詬難，甚且因此被羅致於崇禎皇帝欽定逆案之中。後因政局混亂，流寇橫虐，而冀望能受不次召任，然卻爲復社以「留都防亂公揭」驅除於南都外。一連串遭受官僚體制中政治派系主流之阻礙，使得阮大鍼心境隨著年歲增長，亦發的無法解開與東林、復社人士相讎的死結，遂趁其於弘光朝復起任兵部尙書之機會，對東林、復社之人加以報復，卻因局勢危急而不果。

清兵南下，南都失陷，阮大鍼欲投靠魯王，卻被視為禍害而不被接納，因此選擇降清之途。然而長久遭受東林、復社詆譏，而有畏懼的心理。也因畏懼讒言而不顧年老氣衰的身體狀況，為證明身體硬朗如昔，而在險峭的山路鼓勇逞強，氣竭而亡。終其一生所為當是明末黨爭下的犧牲者。而其文學作品如詠懷堂詩集冊之不傳，與在文學史上地位不彰顯，當是明史記載偏叵之所致。